

嫩红浅绿与枝繁叶茂

—《花的原野》六十年散文扫描

□额尔敦哈达

散文作为“境界的艺术”，或情感摇荡，或筋骨思理，或直面人生，或直抵灵魂，历来是文学创作的重镇，是文人雅士直抒胸臆、陶冶心灵最适宜的形式之一。

塞北漠南蒙古文期刊《花的原野》在60年的峥嵘岁月中，可谓与蒙古文散文创作共赏明月、共度春秋、共同成长，培养了几代蒙古文散文创作队伍，也见证了整个当代蒙古族散文创作。据粗略统计，从第一篇《晨雨》(1956年9期)到最近一期的《回想》(2015年11期)，《花的原野》共发表散文726篇，其中1955—1966年间为83篇，1972—1976年为26篇，1977—1978年12篇，1979—1984年103篇，1985—2000年260篇，2001年—2015年242篇，形成一股逐年增长的态势。虽然干巴巴的数字证明不了什么，但从数字可以看到，这片花的草原上蒙古文散文这棵绿树从孕育到生根发芽、枝叶一片稚嫩到繁茂的发展进程。

一切事物在她的发展初期，都显得幼嫩可爱，如花之吐蕊、树枝之发芽。纵观《花的原野》1955年—1966年83篇散文，无论其篇幅、体制还是艺术表达、主题主线都显得简洁明了和单纯可爱。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个火热的年代，那个岁月人们不喜欢过多的染色，讨厌复杂，追求单纯。1956年的第一篇散文，以柔美的语调歌颂了冒雨赶牧村为牧民治病的革命医生，之后几年的散文是或者反映蒙古族人民新的幸福生活，或者描写顽强抗争自然灾害的模范牧民，或者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或者是一些战士们的革命回忆录，主调积极向上，令人鼓舞。在这片嫩红浅绿中，值得一提的两篇散文是其木德道尔吉的《秋日的早晨》(1962年3期)和玛拉沁夫《鄂伦春散记》(1963年2—3期)。《秋日的早晨》以一种清丽的笔调，描写作者家乡一个普通的秋日早晨万物宁静，孕育一片幸福和希望的景象，散文体式简洁而格调淡雅，属蒙古文散文中的早期美文。而玛拉沁夫的文章已经显露了作者创作才华和小说家宏大叙事的早期萌动，无论体量还是艺术格局都显露了当时散文创作的高规格。

当历史的车轮沉重地滚入那个不可预知的年代的时候，《花的原野》也被迫停刊，直至1972年，以《革命文艺》的名义复刊，各题材文学作品按着过去的经验发表和运行。虽然时代的印痕不可避免地隐藏在字里行间，但发表在《花的原野》上的散文作品还是反映了民族团结、军民团结，表达了对远道而来的知识青年的欢迎，积极描绘了家乡的各种发展变化，表现了草原文学创作者们一以贯之的正直和忠诚。

1979年是《花的原野》散文创作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里，后来被称为“新时期蒙古族散文三家”的苏尔塔拉图、桑·舍里布、宝·普日来都在《花的原野》发表了重要的散文作品；被称为“学者散文”(文化散文)的巴·格日勒图早期成功作《向着北斗星》也在当年一期发表；文学活动组织家和作家特·赛音巴雅尔50年代就开始发表散文，这一年也有重要作品在《花的原野》发表；作家玛拉沁夫、葛尔乐朝克图都有作品在《花的原野》上发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景象已经为整个80年代蒙古文散文创作定了基调。更有必要提及的是，在“英雄故事”的传统中已经孕育了文化寻根和学术寻觅，表明蒙古文散文开始向一个新的高度奋进。在1980年代那个火热、温馨、积极向上而又单纯可爱的岁月里，创作者们基本上在寻觅、探索、回望，而在艺术上更是精益求精，凝练陶冶，文字如金石，刚健又琳琅。宝·普日来《古上都》(1979年11期)是新时期第一篇历史文化题材作品，苏尔塔拉图《遥远的库伦》(1980年2期)是第二篇，色·乌力吉巴图《契丹古都访古》(1980年3期)是第三篇，这么短的时间内出现如此多的文化题材散文，是蒙古文散文创作的一个新的态势。而策·吉尔嘎拉《莫尔

格勒牧场》《草原珍珠海拉尔》从景物描写中窥视了文化的天空。清照日格图的寺庙题材散文也表达了文化寻根精神。玛拉沁夫的《大地》(1982年2期)是给人以另一种启示和审美快感的作品。一片茫茫大地下到底藏有多少“黄金”，是玛老先生的另一种寻觅。后来被选入课本、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的苏德那木《阳光下》是一篇淡雅的美文，文章用轻轻的笔触，在一片淡淡的叙述中表现了一种高贵的单纯。老作家阿·敖德斯尔发表了第一篇国外游记(1980年10期)，为蒙古文读者敞开了一个未知的世界。巴·格日勒图《玉门春常在》继续他的学者散文路线，洋洋洒洒、说古论今，昭示了80年代散文的文化厚度。

1985—1995年的10年是蒙古文散文进一步成熟、沉稳发展的10年。10年间《花的原野》发表的散文数量并不多，但散文发展的态势不容忽视，散文的内蕴进一步强化，新一代散文队伍逐渐形成，都为《花的原野》和新时期蒙古文学增添了浓墨的一笔。1985年就有《拉萨行记》《一封金镯》《家乡的梦》等不俗的散文作品见诸报端。1988年开始，葛尔乐朝克图以《沉思录》为名，连续10年在《花的原野》上发表同名散文，以深邃的思想、诙谐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刚健的笔触，在蒙古语阅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应该说《沉思录》是新时期蒙古文散文相当沉重的一笔。1987年是《花的原野》散文创作重要的年份，1到4期连载了力格登的《蒙古行记》；4期发表苏尔塔拉图《美丽的云彩》；5期发表了扎拉嘎胡·特·赛音巴雅尔的游记；7期发表葛尔乐朝克图、赛希雅拉图等老作家和呼和木齐、照日格图、敖特根巴雅尔的散文作品，集中展示了蒙古文散文创作队伍的集体势力。其中力格登的《蒙古行记》是新时期以来，中国作家写的第一篇系统介绍蒙古国文化、艺术、教育和日常生活的长篇散文，为促进双方友好交往起到了积极作用。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一代散文创作队伍通过《花的原野》成长起来，并在《花的原野》展示了他们的才华和创作上新的探索。博·照日格图在这一期间发表《欢乐的雨露》《清明节的纪念》《合作社》《小作家的小屋》等意蕴深邃而富有生活韵味的散文，斯琴毕力格发表了《不能忘却的纪念》《编写连心》《干旱的忧虑》等语言优美散文、意境深远的文章，满全、乌·纳钦、特·布和毕力格、瓦·赛音朝克图等更年轻一代也崭露头角，伍·甘珠扎布、博·那顺乌日图等资深散文家积极参与，共同奏响了蒙古文散文优美的交响乐。不能忘记的是诗人那·松迪的散文《爱的露珠》(1994年6期)。诗人同名散文集是新时期蒙古文散文的顶级作品，而发表在《花的原野》的是集诗人爱意、思想、人生追求的沉甸甸的一篇。

1996年第1期以“蒙古文散文的雨露”为栏目标题发表了12名散文家的力作。其中既有领导者的散文，也有老一代作家的新作，更有蒙古文散文更新一代的代表作品，标志着散文创作进入新的、更有活力的时期。叶尔达、策登巴尔、乌仁高娃、贝·哈斯毕力格等在这一时期走上散文创作的道路。之后到1999年，《花的原野》的散文，都以一种深邃、蕴含和寻觅影响着广大读者。1997年第5期发表希儒嘉措的《古都遐想》。《古都遐想》是90年代蒙古文化散文的代表作，作者从一处古都废墟瞻仰历史、俯瞰当今，对历史兴衰、悲欢离合发出了独特的感叹，具有较强的历史意识和艺术感染力。1997年11期和1998年4期发表那·乌力吉巴图的《遥远的东京湾》，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描写了留日学生的学习、生活、奋斗和迷茫，散文既有高妙的精神追求，又有面对现实的辛酸味道，和走马观花式的旅游笔记不同，这是从残酷的现实生活出发的一朵小花。年轻的叶尔达发表了《顶天立地

蒙古人》《岛国、长调、狂野孩子》等散文，承接学者散文路线，在沉思、在探索、在挖掘……

2000年的《花的原野》在散文创作方面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为了繁荣散文创作，举办了一年的散文比赛；二是结合办刊纪念活动，发表了许多纪念性散文，以促进散文创作的姿态迎接了新千年。之后的十多年《花的原野》散文创作基本是以复调形式结合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作品，以积极健康的姿态，顺着时代潮流积极向前。纵观新世纪十多年《花的原野》散文创作可以发现，创作队伍呈现多维复调格式。老一代散文家苏尔塔拉图、桑·舍里布、宝·普日来、策·吉尔嘎拉、色·乌力吉巴图、高朝、苏德那木笔耕不辍、硕果累累；其后的博·照日格图、斯琴毕力格等更加成熟，作品尤为韵味十足；额·乌日根、吉格登旺杰、叶尔达创作势头正旺；更为可喜的是，新世纪初年，蒙古文散文队伍的新一代蓬勃成长，亚·查干木仁、博·乌兰、查干鲁斯、楚里格尔、奥·阿拉腾高娃粉墨登场，几代散文家以各自的色彩、各自的声音共同绘制了新世纪散文的多彩旋律。高朝先生曾是《花的原野》资深编辑，世纪之交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回忆性散文，回顾初创时期的《花的原野》，缅怀老同事们为刊物作出的贡献，字字真言，句句实话，感人至深。博·照日格图在2005年发表了两篇重要散文，分别是《乌兰巴托散记》和《图尔基山迷梦》，从叙事的宏大、意蕴的深刻、文字的精炼上讲，都是当年的代表性作品。“云彩诗人”吉格登旺杰发表了云彩散文，他的云彩描写引起了文坛的关注；特·布和毕力格对狼群的描写是文化的和反思的；额·乌日根的散文表现了极强的批评意识。新一代在散文内涵的追求、境界艺术的把握和语言表达的精密方面都有新的突破，虽然刚刚步入文坛，还未形成规模，但已经昭示蒙古文散文创作更加迷人的未来。2012年一年，《花的原野》举办“精散文”比赛，为散文的进一步边界化、思想化和精小化探索了路子，为散文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园地，培养了许多新的力量。

回顾60年前《花的原野》创作发展的道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小结。一、弘扬正能量、主旋律，传送时代歌声。从创办的1955年到2015年的60年间，《花的原野》始终如一坚持健康办刊方针，注重健康和积极向上的精神，为广大读者传送了时代歌声，陶冶性灵、铸造灵魂，为几代人输送了健康的话语，为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二、五代散文家共同的艺术家园。《花的原野》散文栏目，见证了五代散文家的成长历程，《花的原野》60年散文是五代散文家共同铸造的精神家园、艺术家园。五六十年代，以敖德斯尔和玛拉沁夫为代表的散文队伍，到80年代初期培养出苏尔塔拉图、宝·普日来、桑·舍里布、巴·格日勒图、策·吉尔嘎拉等新时期散文主力；80年代中后期又出现博·照日格图、斯琴毕力格、希儒嘉措等新一代；90年代中期叶尔达、策登巴尔等更新一代走上文坛；新世纪，新一代出现在散文栏目里……共同奏响了蒙古文散文的交响乐。这也是中国蒙古文散文60年发展的见证之一，《花的原野》培养了五代散文创作队伍，成为蒙古文散文创作的主要阵地和花园。三、从话语粗放型向艺术集约型的发展历程。《花的原野》60年散文创作的发展是蒙古文散文在内容和艺术上逐渐成熟、逐步发展的历程。当艺术的魅力尚显微弱的时候，内容和形式的结合总是那么不协调、话语总是那么粗放，而成熟之后作品的各要素总是那么融洽，艺术构造总是那么集约、和谐。60年散文从开始到现在总的追求、渴望是能够体现散文艺术的真正内涵，能够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而这一追求和渴望在几代散文家的努力中得到了实现。

美哉！这一片嫩红浅绿和枝繁叶茂。

萧殷是我国著名文学家、文艺评论家，《文艺报》的创始人之一，逝世于1983年。2015年12月8日在广州举办的萧殷百年纪念研讨会，由广东省文联、省作协、羊城晚报社和省评协等萧殷先生生前工作过的单位举办，蒋述卓、李劲堃、杨克等100多人参与，与会者中有一位年近90岁高龄的老作家徐楚，坐着轮椅来就是为了说一句“萧殷是个好人！”

落其实者思其树 饮其流者怀其源

中国现代文学馆计雷以南北朝文学家庾信的语句缅怀萧殷对文学青年的培育和扶持，也对萧殷先生为新中国早期文学人才培养和文艺评论的开拓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以及其留下的优良传统和精神财富做出了恰当评价。萧殷在解放前就长期担任《解决》(三日刊)、《石家庄日报》等报刊的编委工作，并始与文学青年结下了不解之缘。1946年，在担任《晋察冀日报》副刊主编期间，曾收到一位业余作者的短篇小说，字迹潦草，几乎不能辨认。经过一个星期夜晚的时间，认真阅读，连读带猜，才把稿子读通了，令他惊喜，原来这是一篇十分出色的短篇小说，于是交给女秘书抄写。不料十几后天后战局紧张，必须从张家口撤离，那位女同志先撤退了，慌乱中把这篇稿子丢失了，这件事令他十分痛心，深感稿子丢失了，好作品不能问世，好作者也埋没了。此事成为他一生兢兢业业、用心发掘文学青年的动力。白桦的第一篇小说、邵燕祥的第一首诗，都是经他手发表的；他极力推荐王蒙力作《青春万岁》；陈国凯、吕雷等知名作家都得到过他的指导与帮助。知名学者、评论家饶范子、黄树森、黄伟宗等都曾是他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他利用担任《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编委，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副所长，以及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客座讲师等身份，编写了很多指导青年写作和文学理论方面的书籍，继续毫无保留地帮助扶掖文学青年，着力开拓新中国的文艺评论事业。

《文艺报》副总编辑崔艾真在研讨会上介绍，萧殷先生是新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专业报纸《文艺报》的重要创始人，与丁玲、陈企霞同为首任三位主编，为《文艺报》确立办报方针、编辑思想和专业风格，乃至成为新中国文艺创作理论和实践中影响最为广泛的主流媒体贡献了热情、才智和青春年华。近几年，《文艺报》在境外的发行已经跃升至中文报刊的前五位，这无不凝聚着包括萧殷在内的历任主编的心血和努力。报社会议室墙上一直悬挂着几任老主编的照片，不断地提醒着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和媒体人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成为我们把报纸越办越好的不竭动力。

与会学者和专家纷纷表示，正是这些老一辈文艺工作者的艰辛努力，奠定了新中国文艺事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只有牢记、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文艺工作者的优良传统，才能创作推出更多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代表现代中国形象的优秀作品。

业师易得，仁师难求

文化学者黄树森以此誉其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伟大人格力量的标杆式人物。他说，萧殷先生担任《作品》杂志主编时，定下了三条“不近人情”的规矩，一是退稿信必须超过5000字，以示对作者和作品的负责；二是年青人发表作品要经常更换笔名，脚踏实地，不能祈求一夜成名；三是外出采访要善于提“问题”，而不是“问号”，所提问题要深思熟虑、有的放矢，抓住实质。著名作家金敬迈回忆到，萧殷先生曾因他的一篇小作而主动邀他面谈，给予详细辅导，使他后来创作《欧阳海之歌》大受裨益。萧殷经常给素未谋面的业余作者回复十数页长的信件，有的还是在病榻上断断续续写

成的。广东省老领导张汉青回忆，萧殷先生对文学青年的指导与帮助，大多是以鼓励为主，但也有直陈其弊，严厉批评的。他在讲话中引述了萧殷回顾自身文学道路时的一段感慨，“在社会主义时代，我觉得无论如何，不应当像旧社会那样，让文学青年乱碰乱撞了。”“越来越自觉地投身于辅导青年写作的工作，可以说是一头钻进去，再也出不来了，为此匆匆三四十年，现在不觉年近古稀，两鬓已白，始终未能越出雷池一步，分不出力量来研究其他文学问题，只能在这个小圈子里留下几个脚印而已。”然而，正是这几个看似不起眼的“脚印”，支撑起萧殷先生甘当绿叶、甘为人梯的人格力量，也激励了无数文学青年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砥砺前行。

本次研讨会，大家谈得最多的就是萧殷这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宝贵精神。“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现今的文学事业要发展，文艺评论要振兴，正是需要越来越多像萧殷这样具有执著的献身精神的“伯乐”，优秀人才不断脱颖而出的土壤才能越来越丰厚。

实事求是，高山景行

与会者在研讨会上纷纷谈到，萧殷一生中不仅在文学青年的培养工作上不遗余力，而且在对待原则问题和评论工作中，服膺真理，固守良知。在“十年动乱”中，他表现了一个文艺工作者应有的高风亮节，不跟风批判，不愿“检举”“揭发”战友和同事。他一生不断学习、不停探索，秉持创作规律，坚守艺术真理，在文学批评领域树立起讲真话、讲道理，不媚俗、不回避、不妥协的应有品格，公开撰文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辩护。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浮夸风，在文艺上也有表现，萧殷看到这种倾向，写了《求实精神与革命热情相结合》一文，批评文艺界的“左倾”现象。1961年，“左”倾主义愈演愈烈，庸俗社会学、简单化的教条主义批评方法盛行。对此，他敢于真刀真枪地面对这个深刻损害创作的问题，在《羊城晚报》发起长达7个月的关于长篇小说《金沙洲》的系列讨论，观点鲜明地批判“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指出文学创作中，理论与实践、创作与批评的客观辩证关系。由他主持起草的结论性文章《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文艺批评的歧路》等三篇文章，在当时的国内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前者是中国文学评论史上闪耀着理论与实践光辉的代表之作，对现今的文学创作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文化学者黄伟宗从萧殷作为广东文学两度辉煌的领军人物之一，以及文艺繁荣发展的五大动力和珠江文脉发展的角度，高度评价了萧殷先生的历史贡献和萧殷精神对推动广东文艺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游焜炳在发言中表示，萧殷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告诉我们，评论应具有独立的价值，不是创作的附庸，健康的文艺批评应抓住根本性、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而不是跟在创作后面瞎起哄，大搞人情评论、有偿评论。缺少实事求是品格和对艺术规律尊重的文艺评论，对优秀作品不是棒杀，就是捧杀，其信誉和作用只能越降越低，本次研讨会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呼唤萧殷精神、弘扬优良传统，力倡实事求是，还原艺术本性，重建文艺评论的正义感和公信力。

作家王蒙和文艺评论家饶范子虽未能到会，但均发来了书面发言。王蒙真切缅怀了萧殷对青年作家的无私帮助。饶范子认为，萧殷先生的文艺批评是开放的、务实的，其评论文章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敏锐、具体、有的放矢，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和针对性。他经常批评那些从概念到概念、脱离创作现状和文学作品实际因而毫无生命力的批评，彰显了一个评论家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梁昭明)

(上接第1版)

践行核心价值观 唱响时代主旋律

坚持一辈子做好事的王福昌老人；身怀六甲、纵身跳进池塘救人的彭伟平；恪守“只卖良心药”祖训的老中医方联海……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同一支支高举的火炬，向整个社会播撒道德之光。

2015年10月13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出的62名全国道德模范和265名提名奖获得者齐聚一堂，接受国家和人民的崇高礼敬。

弘扬主旋律，社会思想就有了主心骨；传播正能量，社会发展就有了动力源。

2015年是宣传文化系统的“基层工作加强年”。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坚持围绕中心、服务群众，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为根本，加强基层工作，唱响时代主旋律，弘扬社会正能量。

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学习宣传教育。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学雷锋志愿服务、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等实践活动，引导人们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大力学习宣传时代楷模、最美人物、身边好人。评选表彰道德模范，健全先进模范发挥作用的长效机制，树立可亲、可敬、可学的榜样，营造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社会氛围；

不断加强基层宣传文化设施阵地建设。如河南省推动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标准化、服务均等化。目前，全省规划建设1702个乡镇综合文化站、3.1万个村文化大院，乡镇文化站实现全覆盖；

积极整合资源，加大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提供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地方戏演出、广播电视收听收看和数字电影放映等服务，夯实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根基；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

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各地坚持不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在抓好公民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推动工作向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教育实践延伸，推动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一年来，各级宣传思想文化部门把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进一步增添措施、整合资源，夯实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为改革发展提供了新的更强的精神动力。

牢固树立精品意识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

“阎肃是在用生命创造艺术的鸿篇巨制，更是在为时代、为梦想高歌，抒发心中的大梦大爱。”军旅作家王树增说。

2015年12月24日下午，被誉为“红心向党、追梦筑梦、德艺双馨”时代楷模的阎肃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战友、家人、后学晚辈纷纷讲述了他们眼里、心中的阎老。

历史告诉我们，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发时代之先声，为伟大祖国鼓与呼。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为中国文艺繁荣发展吹响了前进的号角。

一年来，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紧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抓住推进精品生产这个关键环节，努力开创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艺工作新局面；

——以电影、戏剧、文学等